

“世界文学”景观中普适性与地方性：
汉学家伊维德中国宝卷研究路径与伦理身份
Universality and Locality in the Landscape of “World Literature”: An Exploration of Sinologist Idema’s Research Path of the Chinese Baojuan

李永平（Li Yongping） 乔现荣（Qiao Xianrong）

内容摘要：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前，在古老的东方中国，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翻译、研究、交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历史的细部，可以说，有多少民族和本土的视角，就会有多少种“世界文学”。生于荷兰达伦，大半生辗转欧洲大陆、日本、美国哈佛，毕生从事中国俗文学翻译、研究的汉学家伊维德就是一个典型。作为欧美汉学家的代表，他走过的汉学之路，是欧美汉学家的典型路径。这一路径既是汉学家入门的典型路径，又在研究的文类偏好、研究路径选择上极具伦理身份特色。其中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梳理伊维德译介研究中国宝卷的缘由及身份特色，为新世纪中国成为真正“世界文学”的中心提供一个参照。

关键词：伊维德；汉学家；欧美汉学；中国宝卷

作者简介：李永平，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人类学中心主任；乔现荣，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陕西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陕西科技大学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翻译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17ZDA266】的阶段成果。

Title: Universality and Locality in the Landscape of “World Literature”: An Exploration of Sinologist Idema’s Research Path of the Chinese Baojuan

Abstract: Before the unprecedented era of change, in ancient China, the reading, translation and exchan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early European schola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world literature.” Going deep into the details of history, we can say that there are as many kinds of “world literature” as there are 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Born in Leiden, Netherlands, Will L. Idema spent most of his life in Europe, Japan, and Harvard. H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sinologist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is research path embodies many of the paths of the other sinologists. This path is not only typical for sinologists who get their study started, but also has personal features in literature preference and research path selection. It is both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his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a as part of the center of the real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

Key words: Idema; sinologist; Euromerican sinology; Chinese Baojuan

Author: Li Yongping, is Ph.D. of literature, Postdoctor of history, and Professor as well as a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nxi 710062, China). He is Chief Expert of the major project “Overseas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Baojuan”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He is the Director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ypli@snnu.edu.cn); **Qiao Xianrong**, is a Ph.D. student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nnxi 710021, China). She specializes in the research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qiaoxianrong@sust.edu.cn).

引言

在中华民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际，中国之世界以“世界文学”的面目首先降临。“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是具体存在的，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世界文学”的实践形式多种多样。在古老的东方中国，中国文学与早期欧洲学者之间的阅读、翻译、研究、交流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¹。深入历史的细部，可以说有多少民族和伦理视角，就有多少种“世界文学”（Saussy 11）。要通过中国思考“世界文学”，就绕不过去一个重要概念“汉学”（Sinology）。如果要通过中国发现不一样的“世界文学”，那么生于荷兰达伦，大半生辗转欧洲大陆、日本、美国哈佛，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和传播的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²就是一个典型。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获得一个视域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越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

1 参见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者序。

2 伊维德教授是笔者国家重大项目“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项目组重要成员。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与伊维德教授的交往与邮件往来基础上的，论文同时也参考了时贤与伊维德教授的访谈录及伊维德教授的研究论著，在此对伊维德教授的支持帮助深表谢意。

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察这种事物”（Hans-Georg Gadamer 304）。作为中国文化的翻译和阐释者，伊维德在本土与他者语境间的来回穿梭，由此而在不同身份选择之间形成互动与张力。作为欧美汉学家的代表，他走过的汉学之路，可说是欧美汉学家的典型路径，这既是特定历史时期汉学家入门的典型路径，又在翻译的文类偏好、研究路径选择上极具身份特色，其中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本文通过对资料的研究，结合与伊维德本人的学术交往，梳理这一过程，为新世纪中国成为真正“世界文学”的中心提供一个参照视角。

一、欧洲早期的汉学传统

在周宪看来，跨文化研究中对他人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受到多重语境、历史性、文化间互动以及解释共同体的制约。尽管人文学者的研究常常是个体性的，但是，任何人的研究始终受到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解释规则的制约。在这样的解释共同体中，翻译、阐释、研究活动存在一个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协商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性的、可交流和可理解的。¹ 因此，对伊维德与欧洲汉学的共有知识的互动路径的形成，有必要放在欧洲汉学的解释共同体内部，寻找坐标定位。

17 世纪之前的欧洲汉学一般被认为是“游记汉学”，到了 17-18 世纪发展为“传教士汉学”，19 世纪后才出现了学理意义上的“专业汉学”。² 在这三个阶段当中，欧洲汉学研究的对象随着欧中互动的变化而变化。

从“大航海时代”到 19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与世界秩序重塑，欧洲汉学完成了“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的转变。早在 7 世纪，就有穆斯林探险家来到中国，陆续出版了中国游记。大约成书于 851 年《中国与印度游记》（*Travels in China and India*）就已经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宗教、文化、风俗人情等。13 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997）记录了在中国的风物见闻，游记完成后风靡欧洲，成为了中外关系史上的历史性文献。³ 17-18 世纪，欧洲学者从这些中国游记中提取素材，掀起了 18 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这不仅为日后“专业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而且影响了伏尔泰为代表的“亲华派”的戏剧创作，为此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

1 参见周宪：《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年）22-23。

2 有关汉学发展阶段划分，可参见张西平：“雷慕沙：西方专业汉学第一人”，《世界历史评论》6.4（2019）：5；张西平：“西方游记汉学的奠基之作——《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价值”，《社会科学论坛》8（2017）：115-122；张西平：“卜弥格与欧洲专业汉学的兴起——简论卜弥格与雷慕沙的学术连接”，《国际汉学》1（2014）：107-119+204-205；张西平：“传教士汉学平议”，《世界汉学》1（2006）：114-118。

3 参见钱林森：“论游记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江苏社会科学》6（2000）：153-159。

传播和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¹

初到中国的传教士，为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同，一般都和西方汉学史公认的第一个汉学家利玛窦（Matteo Ricci）一样，以中国知识阶层为榜样，希望成为“西儒”。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传教士群体注定是中西文化的中继站。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文化传统对现世人伦的关切胜过对彼岸灵魂的安顿，这给了传教士群体成为“耶儒”的机会。从时代精神上看，晚明天崩地坼，释家渗入儒家使个性解放和精神自觉成为时代潮流，这让传教士的理想抱负得以伸展。利玛窦在《天主实义》（1604）中力图证明基督教义是溥天之下的神学，他常重复陆九渊的一句话：“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绘制的《山海輿地全图》（1609）悬挂于起居室中，使得本来以为天下仅有十五省的中国士人群体感到极为震撼，起到了振聋发聩，颠倒众生“世界”观的重要作用。² 早期，西方人仍然不了解中国的宗教道教、佛教，对抒情诗、白话小说、散文等不同的文学类型相当陌生，欧洲人只接受合乎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的那一部分中国文化³，其中的选择充满了西方东方主义的幻想、欲望和无意识的想象，是西方人的观看或表征（represent）。当然也与中国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有关，当时中国对传教士研习中国语言文化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学习研究的资源受限。除了研习中国文化，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扮演着对东方中国的“启蒙”的伦理角色，小说无疑被看做是深得人心的形式。19世纪末之前，传教士创作、小说具有鲜明宗教特色，韩南认为，最早的一部为米怜（William Milne）所著。最多产的作家要数郭实猎（Karl Gutzlaff）了，他在19世纪30年代写了七八部小说。影响最大的传教士小说，却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小说《回头看：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1988）所作的摘要。⁴ 中国俗文学书籍出口到欧洲的数量在这一时期较少，因此，欧洲的图书馆收藏明清俗文学作品比较晚。“专业汉学”兴起之后，说唱文学作品的研究起步更晚。

19世纪的汉学，保持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潮流，是一种浪漫式的汉学，含有帝国主义、实证主义，及历史主义的思想。身处欧洲本土的汉学研究与传教士汉学旨趣不同，为了熟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欧洲本土的汉学研究热衷于中国的古代小说和戏曲等俗文学。汉学也因此而客观化，并且逐渐成为

1 最早将中国俗文学作品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是法国的汉学家。18世纪，欧洲已经出现了中国白话故事、戏剧和小说的法文和英文译本，其中，杂剧是最早被翻译的文本类型之一。1735年，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就将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译为法文并出版，此后儒莲（Stanislas Julien）又重新翻译了全本的《赵氏孤儿》，并翻译了李行道的《灰阑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

2 参见卜正民：《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潘玮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3 参见 Gaunting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 1968)。译文引自《东方杂志》复刊第20卷第8期。

4 参见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4。

一门主要的学科。19 世纪后，专业汉学确立，欧洲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汉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小说戏曲在中国的低下地位，因此，逐渐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失去了兴趣。欧洲各大图书馆对俗文学的收藏也日渐失去兴趣。

20 世纪初，欧洲汉学家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而中国学者开始将传统白话文引入文学研究，这一研究动态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二战后，汉学范式发生重要转型，以欧洲为主要研究阵地的“汉学”研究，转变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研究”。近年来，这两种汉学模式互有借鉴、互有融合。

伊维德出生于欧洲早期汉学的摇篮——荷兰。1853 年夏，帕赫德氏 (C. F. Pahud) 在莱顿大学成立了汉语研究院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iden)，13 年后，该中心的第一届学生施莱格尔 (Gustave Schlegel) 博士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天地会：海外华人秘密结社之研究》 (*ThianTi Hwui: the Hung League Heaven, Earth 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 1866)，重点研究了海外华人天地会在组织结构和礼仪规定等方面的问题¹。1875 年，施莱格尔博士成为莱顿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²

19 世纪欧洲的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曾在莱顿大学学习，莱顿因此成为欧洲汉学早期的重镇。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主要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文化史的田海³ (Barend J. ter Haar) 就是其中成绩突出的一位。生于荷兰的伊维德就是在这种变动中的国际汉学环境中，继承了伦理身份，成长为日后在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汉学家⁴。由于受到日本视域的影响，又伴随着国际汉学中心的迁移，作为叙述者的伊维德，在某种意义，超越了身为欧洲学者的东方主义“帝国之眼”的凝视，他的研究呈现出对世界文学的更为丰富的认知。

二、从戏曲到宝卷的汉学路径

追本溯源，伊维德的汉学之路始于美国作家赛珍珠 (Pearl S. Buck) 的译

1 参见 Gustave Schlegel, *ThianTi Hwui: the Hung League Heaven, Earth 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 (Batavia: Lange & Co., 1866)。

2 参见刘正：《图说汉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3 田海著作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1992)、《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 (*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2006)、《践行经文：中华帝国晚期的世俗佛教运动》 (*Practicing Scripture: A Lay Buddhist Move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14) 等。

4 伊维德，荷兰的汉学家，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欧大年 (Daniel L. Overmyer)，主要研究明代新教派的起源，对民间教派文研究著述颇丰，也是研究宝卷最早的欧洲学者之一；另有，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曾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施舟人 (Kristoffer Schipper)，以研究道教闻名，著有《道体论》 (1982)、《道藏通考》 (2005) 等；此外还有，荷兰汉学家龙彼得 (Piet van der Loon)，他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戏曲与傀儡戏。

作《牡丹》(1948)和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小说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的《大唐狄公案》(2018)系列小说。那时赛珍珠刚获得诺贝尔奖,这让年轻的伊维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荷兰莱顿大学完成了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之后,伊维德到日本北海道大学、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1968-1969),跟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谦二(Kenji Tanaka)学习中国的元曲。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Masaru Aoki)之后,日本中国戏剧造诣最深之耆宿。在北海道大学社会学系访学时,伊维德学会了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文学,近代以来,日本曾经扮演着近代社会变革语词“东渐”和中国文学“西游”的中介角色,这些对他之后的文学研究视域和偏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研究生阶段,伊维德对白话叙事文学的兴趣让他走向了“杂剧”“散曲”研究之路,他在中国通俗小说、民间歌谣及女性文学领域发表了许多著述。伊维德的博士论文《中国白话小说:形成期》(*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1974),主要研究了中国早期的白话小说,他认为话本不一定是说书人的脚本,话本与戏曲、杂剧、小说等都互有影响,而且话本语篇形式的改变受到社会经济环境、表演形式、其他文本等影响。¹博士毕业后,伊维德选择留校任教,第一份工作是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的中国资料中心担任图书馆助理,书写图书卡片。这份工作对伊维德后期俗文学版本问题、故事结构演变等研究领域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²杂剧和散曲需要运用大量的白话,被广义的称为“元曲”。³柯润璞(James Irving Crump, Jr.)认为“曲”既可以用来抒情也可以用来叙事,因而也包括了简单、直接和未加修饰的白话。⁴伊维德在某种程度上因袭了从平话到白话,再到杂剧、戏曲的研究路线。

从戏曲入手,翻译、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让伊维德的汉学研究独树一帜。翻译是汉学教学、研究的重要入门工作。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教期间,为了给美国博士生开设中国讲唱文学,给本科生开设中国民间故事、《聊斋志异》故事课,为研究中国古代戏剧,伊维德开始翻译元杂剧。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闽南歌仔、宝卷、江水女书等。

伊维德的杂剧翻译实践,也经历了不同阶段。正如上文所述,一开始翻译的目的是为欧美学生学习汉语提供课外读物,后来是为了研究文学故事背后的社会现象,再后来是为了美国本科生做选修课的教材。伊维德认为不同

1 参见 Wilt L. Idema,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Leiden. 1974).

2 参见 Beata Grant and Wilt L. Idema, *Escape from Blood Pond Hell: The Tales of Mulian and Woman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其中,对“黄氏女”姓氏、情节和人物设置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的变化有详细考述。

3 参见杰夫·凯勒、吴思远:“柯润璞与中国口述表演文学研究”,《中华戏曲》1(2015): 1-19。

4 参见杰夫·凯勒、吴思远:“柯润璞与中国口述表演文学研究”,《中华戏曲》1(2015): 1-19。

的需求也影响翻译时杂剧文本的选择、体例的呈现，甚至这种翻译也能够反映出翻译者的文学、学术修养。有些译者会任意删除对他们来说没有意思的段落，同时也会修改文类样式以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中国文学导读》（*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97）是在他 1980 年代授课演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1996 年出版了该书荷兰文增订本，1997 年该书有了英文版。为了让欧美学生读懂中国典籍，伊维德与汉乐逸（Lloyd Haft）合作，将大量中国文学翻译成荷兰文和英文。迄今为止，他已经将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荷兰语，并且还系统地介绍了敦煌变文、明清话本、笔记小说等诸多的叙事文学，许多英文译著也都是荷兰文在先。目前，伊维德虽已荣休，回到莱顿，但依旧笔耕不辍。他计划完成与奚如谷合作的《杨家将演义》（待出版）译本的出版以后，接着出版“庄子遇骷髅”各种相关版本的英文版。回顾他的学术人生，伊维德十分感慨地说，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的时候正值冷战期间，对当代的中国无法了解，只好将目光转向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¹

伊维德的戏剧研究，建立在与奚如谷（Stephen H. West）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早期合作的著作《中国戏曲资料（1100-1450）》（*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 1982），收录了他们合译的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1982，出自《永乐大典》）、《紫云亭》（元刊本）、朱有燬的《复落娼》、《香囊冤》和《蓝采和》五部剧作²。同时伊维德也翻译了相关文献资料及第一手的宋、金、元、明时期的戏曲资料。与此同时，他还与奚如谷一起翻译的弘治版的《西厢记》（1498），1991 年版更名为《月与琴：西厢记》（*The Moon and the Zither: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³，1995 年再版名称为《西厢记》（*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伊维德认为，将《西厢记》改为诸宫调或传奇，是考虑到表演程式上的实际需要，对原文本进行内容上的改编。⁴伊维德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翻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除了《西厢

1 参见凌筱峤：“重构戏曲与文学史——伊维德教授的学术研究”，《戏曲研究》2（2014）：311-319，以及伊维德：《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 年）7。

2 其中，《紫云庭》是《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孤本；两部朱有燬的剧作来自 15 世纪初期的刻本；《蓝采和》来自 1588 年左右出版的《古名家杂剧》。《元曲选》中则选了《货郎担》的最后一折。参见伊维德、凌筱峤：“元杂剧：版本与翻译”，《文化遗产》4（2014）：46-56+157-158。

3 参见 Wang Shifu, *The Moon and the Zither: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ed. and transl.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H. West and Wilt L. Idema, with a Study of its Woodblock Illustrations by Yao Dajun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1): xiv +506.

4 参见伊维德、凌筱峤：“元杂剧：版本与翻译”，《文化遗产》4（2014）：46-56+157-158。

记》外，他英译的作品还有《汉宫秋》¹《迷青琐倩女离魂》²等元代戏剧，这些译作被欧美学界视为汉学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最近十年，奚如谷与伊维德更侧重于14世纪刻本元杂剧的翻译。《和尚、强盗、战争与神仙：十一部早期中国戏曲》（*Monks, Bandits, Battles and Immortals: Eleven Early Chinese Plays*, 2010）³均以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参校。其中关汉卿的《拜月亭》使用的是14世纪版本。朱有燬的两部“水戏”使用15世纪初的刻本。白朴《梧桐雨》选自《元曲选》，而其它的剧作翻译底本为《古名家》或《元曲选》。2012年出版的《战争、背叛与结拜兄弟——早期中国三国戏》（*Battles, Betrayals and Brotherhood: Early Chinese Plays on the Three Kingdoms*），其中翻译了七部杂剧。这七部杂剧，一部是朱有燬的创作、两部是内府本杂剧、一部是晚明刻本杂剧（另附《元曲选》本），还有三部14世纪的元刊杂剧，分别是关汉卿的《单刀会》、《西蜀梦》和无名氏的《博望烧屯》。目前，奚如谷和伊维德将要出版的《赵氏孤儿及其它早期杂剧》（*The Orphan of Zhao and Other Early Plays*，待出版），其中翻译了七部14世纪刊本杂剧。他们分别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附《元曲选》本）、杨梓的《霍光鬼谏》、张国宾的《薛仁贵》（附《元曲选》本）、高文秀的《好酒赵元》（附脉望馆钞校于小穀藏本）、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无名氏的《焚儿救母》。目前为止，14世纪的三十种元刊杂剧中，他们已经翻译了十二种之多。⁴

在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系任教期间（1976年1月至1999年9月），伊维德分别于1977年、1987年、1993年、1998年、1999年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Manoa）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高等研究学院和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2000年至2018年，伊维德前往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工作，此后，与国际汉学中心一道，他的研究也转移至美国，在哈佛大学从事教学科研长达二十余年直至荣休，其中先后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工作。可以说，伊维德是一位对欧洲和美国汉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汉学家。

1 参见 Idema, Wilt L., “Li Kaixian’s Revised Plays by Yuan Masters (Gaiding Yuanxian chuanqi) and 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of Yuan Zaju as Seen in Two Plays by Ma Zhiyuan.” *Chinoperl Papers* 26 (2005-2006): 47-66.

2 参见 Stephen H. West and Wilt L. Idema, *Monks, Bandits, Lovers, and Immortals: Eleven Early Chinese Play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2010): xlii + 478.

3 该著作翻译了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包待制三勘蝴蝶梦》、《闺怨佳人拜月亭》；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郑光祖的《迷青琐倩女离魂》；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无名氏的《汉钟离度脱蓝采和》；朱有燬的《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李逵仗义疏财》；无名氏的《小孙屠》等11部戏剧，该书对外国人阅读元、明杂剧及南戏很有帮助。

4 参见伊维德、凌筱峤：“元杂剧：版本与翻译”，《文化遗产》04（2014）：46-56+157-158。

三、伊维德的宝卷研究之路

在莱顿大学工作时，由于学校中国俗文学典藏丰富，伊维德涉足了多种中国叙事文学传统（说唱文学 / 曲艺）。社会学、中国文学等跨学科学术训练让伊维德对传统叙事文学类型的多样性、不同文学类型的故事改编方式产生了浓厚的感兴趣。由于对文类的理解，欧美学者会把宝卷看做小说。早在1833年，葡萄牙的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把从普陀寺得来的《香山宝卷》看做“一种易懂的、甚至粗浅的风格”写成的“佛教小说”，称《香山宝卷》为“香山的小说”（“The Story of Fragrant Hill”）（韩南 67）。中国话本小说、戏剧与宝卷的改编关系让伊维德开始关注宝卷。因此，伊维德和其他汉学家一样，从汉学研究开始，历经了从评话、戏剧、民间故事，再过渡到了宝卷。20世纪初，在俗文学转向的带动下，宝卷这一俗文学传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与管佩达（Beata Grant）合作完成的《黄氏女传说：从污染到净化》中，伊维德比较《金瓶梅》中《黄氏女故事》情节时了解到其中多处对宝卷念唱活动的描写，这一部分的研究，在他为《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撰写的第五章“说唱文学”中有充分的概括。¹

2001年前后，伊维德参与撰写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第41章“传统戏剧文学”²，其中特别提到了宝卷研究³。此后，伊维德为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撰写了第五章“说唱文学”。其中“早期的宝卷和道情”部分，伊维德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香山宝卷》宝卷的题材来源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香山宝卷》宝卷的题材很可能源自一个在南宋依然表演着的“说因果”文本。无论它的实际创作年代究竟为何时，根据16世纪初期的一则史料，这个文本在16世纪后期就已经存在了。然而，现存最早的刻本刊刻于1773年。1773年刊刻的全本中还包括一些反教的片段，明显与海中小岛普陀山成为圣地这一流行现象有关。17世纪之后，道情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是唐代儒学家、诗人韩愈被侄子韩湘子点化的故事。韩湘子

1 伊维德在研究管佩达的“The spiritual Saga of Woman Huang from pollution to purification”一文时，认为非教派宝卷持续流行于16、17世纪，这一点可由16世纪匿名小说《金瓶梅》及其17世纪的续书——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中有关宣卷活动的描写得知，因此只有当类似《黄氏女对真经》、《香山宝卷》等非宗教宝卷非常流行时，才可能被写进小说。参见 Wilt L. Idema, “English-Language Studies of Precious Scroll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Chinoperl Papers* 31 (2012): 163-176。

2 参见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文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该书200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3 第49章“口头程式传统”（马兰安，Anne E. McLaren），提到宗教宝卷于15世纪开始盛行，并开始具有许多小说的特质。这一提法也许是作者对宝卷故事与民间故事对比而来。同时，作者认为宗教宝卷也包含了源于民间娱乐的虚构内容，抄写宝卷可以积累功德。也提及《金瓶梅》的一个早期版本中“尼姑”为富户女眷表演宝卷的描。参见 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文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991、995、1102。

是八仙之一，他的故事见载于 16 世纪的小说《东游记》。故事中，韩湘子再三希望点化叔叔，但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动摇韩愈的儒家信念。当韩愈因反对皇帝奉迎佛骨被贬至潮州时，他才领悟到所有尘世的荣耀皆为虚空，从此一心修道。¹

由于对中国戏剧版本问题的研究积累，伊维德认为，对传统戏剧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时代、地区、文化对民间说唱文学都有影响。²

据伊维德本人讲，他翻译宝卷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他们的文学质量外）是宝卷长度适中。³ 许多著名的弹词和鼓词篇幅过大，伊维德认为不太适合翻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元曲选》等戏曲唱词，宝卷的韵文部分相对更加口语化，更容易理解和翻译。伊维德译介的宝卷包括⁴：

1. 《目连三世宝卷》全译版⁵。
2. 《香山宝卷》简译版及《善财龙女宝卷》全译版⁶。
3. 《孟姜女宝卷》及《孟姜女哭长城宝卷》翻译版⁷。
4. 《张四姐闹东京》全译版⁸。
5. 《雷峰宝卷》全译版⁹。

1 参见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2 参见伊维德，凌筱峤：“元杂剧：版本与翻译”，《文化遗产》04（2014）：46-56+157-158。

3 这一观点源于伊维德与作者的通信内容。

4 参见 Wilt L. Idema, *English-language Studies of Precious Scroll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An Updated Version, Leiden) August 30, 2014.

5 参见 Beata Grant and Wilt L. Idema, *Escape from Blood Pond Hell: The Tales of Mulian and Woman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35-145. 该书收录了《目连三世宝卷》和《黄氏女对金刚》英译本。《黄氏女对金刚》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该版本是黄氏女故事的唱本，不属于宝卷，故不计入。

6 收录于 Wilt L. Idema, *Personal Salvation and Filial Piety: 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f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 Kuroda Institute Classics in East Asian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227. Reprint: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2009.

7 分别收录于 Wilt L. Idema, trans. and introd., *Meng Jiangnü Brings Down the Great Wall. Ten Versions of a Chinese Legend, with an essay by Haiyan Le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112-159, 181-213.

8 发表于 *CHINOPERL Papers* 31(2012): 37-112.

9 收录于 Wilt L. Idema, *The White Snake and Her Son: A Translat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under Peak, with Related Texts*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Hackett, 2009): 7-84.

6. 《庄子蝶梦骷髅宝卷》翻译版¹。

7. 《沉香宝卷》全译版²。

由此可以看到，伊维德的宝卷翻译主要倾向于文学故事卷。同时，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伊维德多采用合作翻译的模式，这样做更容易让目的语读者接受。在翻译《目连三世宝卷》和《黄氏女对金刚》时，管佩达（Beata Grant）先拟稿，伊维德再进行修饰润色。伊维德认为翻译的首要目标是让目的语读者以自己的方式和“味道”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尽量减少翻译注解，让译作忠实于原作且通俗易懂。因此，涉及译文中提到的问题和人物时，他采取的是将详细信息和专家见解附在参考文献中的方式³，以尽量增强阅读的流畅感和舒适感。

在海外汉学家中，伊维德是为数不多的宝卷译介与研究并重的学者。中国学者研究宝卷多从宗教、文学和民俗入手，而海外汉学家却与之不同，除了宗教、文学之外，也从艺术角度入手译介和研究宝卷。伊维德研究宝卷，采用了历史、文学、艺术综合研究的方法，注重不同版本与故事演变的历史考察，也注重研究宝卷念唱的曲艺特点。他的论文《观音的鹦哥》（“Guanyin’s Parrot. A Chinese Buddhist Animal Tale and Its International Context”，1999），对郑振铎的《鹦哥宝卷》的“劝孝”说予以反思，认为《鹦哥宝卷》中鹦哥故事的本事是《杂宝藏经》中的佛本生故事⁴。正因为这种历史意识，伊维德在翻译研究的同时，特别注意对宝卷研究史的梳理。从“早期研究”“宗教宝卷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宝卷翻译”“研究近况”等五个方面，伊维德全面地分类、归纳、总结了欧美宝卷研究成就，完成学界广泛关注的综述《宝卷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⁵，该综述为海外学者研究宝卷提供了重要的入门参

1 收录于 Wilt L. Idema, “Traditional Dramatic Literature,” in Victor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220-253。

2 收录于 Wilt L. Idema, introd. and trans. “The Precious Scroll of Chenxiang.”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 Ed. Victor Mair and Mark Ben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380-405。

3 参见 Beata Grant and Wilt L. Idema, *Escape from Blood Pond Hell: The Tales of Mulian and Woman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1): ix。

4 在论文《改头换面的孝鹦哥——〈鹦哥宝卷〉短论》中，伊维德进一步研究1967年发现于上海嘉定的明成化说唱词话《全相莺歌行孝义传》和藏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的《鹦哥宝卷》（1872年，南京刊本）后，认为不同版本中鹦哥形象的演变与故事增删、改头换面的重写，形成一个谱系，它背后是思想史，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历史意识、读者接受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些都左右着故事的流变过程。

5 “English-Language Studies of Precious Scroll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曾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中国演唱文艺》（*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31(2012):163-176）。此英文初稿由霍建瑜翻译，以“宝卷的英文研究综述”为题刊登于《山西大学学报》35.6（2012）：13-19。补充与修订后的重译稿收入王定勇主编《中国宝卷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广陵书社，2016年）33-48。

考。

1930年,陈寅恪曾提出“预流”与“未入流”之说(陈寅恪 266)。今天域外的“汉学”中的宝卷学¹已成为当前的“预流”。研究人类社会记忆的学者如巴尔特雷特(Frederic Bartlett)曾经提及,人们是透过一种过滤网一样的心理“结构”(schema)来认识外在世界和习得的故事的(Bartlett 278)。这种心理结构是脑文本编码的元语言,“通过口头表达的文学能够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复制成脑文本”(聂珍钊 270),因此脑文本与口头文学关系更密切(聂珍钊、王永 172)。由于身份限定,伊维德的语言习得基本都是通过书写文本完成的,口头文学比书写文本更接近伦理身份。因此,伊维德研究翻译中国戏曲、宝卷存在一定局限,对宝卷的伦理教诲体会不到位。

四、结论:伊维德译介、研究宝卷的路径与伦理身份

伊维德译介和研究宝卷的历史路径与伦理身份密切相关,概括起来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受欧洲汉学家对中国杂剧、戏曲译介文本限制的影响,早期部分传教士、汉学家等译介和研究杂剧、戏曲出于中国欧美文类的双向理解,他们认为和欧洲一样,戏曲在中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掀起了戏剧翻译的热潮。但是,19世纪前的西方学者译介杂剧、戏曲时,难以理解唱词,一般不翻译唱词或大量删减唱词,多翻译宾白,也就是白话部分,形成了西方汉学界偏重译介和研究宾白部分的译介传统,造成了后继海外汉学者学习、翻译、研究杂剧、戏曲等时偏重白话文体研究的现象。伊维德译介、研究宝卷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模式。

其次,宝卷与戏曲、杂剧在故事层面上的相似性,是伊维德研究介入宝卷的重要原因。宝卷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戏曲、杂剧、弹词、诸宫调、小说等互相交融、相互借鉴、彼此杂糅。明清时期的戏曲、杂剧、宝卷三类文本都具有韵散结合、文白夹杂的文学特点。散文部分,可看作宾白,韵文同唱词。但与戏曲、杂剧不同的是,宝卷这种俗文学作品相较于戏曲和杂剧而言,语言更加简练,通俗易懂。尤其对国外汉学家和学习者或读者而言,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是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文学形式。

再次,受西方高校教学、科研一体化的影响,伊维德译介、研究宝卷的缘起与翻译策略的选择出于教学研究需要与个人爱好。伊维德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俗文学“并非等同于老百姓的文学,写俗文学的人毕竟需要一定的文学背景,他们或者是没有中举、中进士者,或者是道士、和尚等,也有一些戏曲、小说的作者还有行政官职”(霍建瑜 77-78)。为了帮助欧美学生尽快了解这些作品,在翻译策略上,按照欧美学生的阅读和书写习惯,

1 “宝卷学”由国内学者李世瑜先生首倡,濮文起研究员做了进一步阐释。参见 濮文起、李永平:《宝卷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2019年)1。

伊维德放弃了韵律，主要翻译文本意义，在书的正文前单辟一章对原文中的翻译所采用的策略进行举证说明。这些说明言简意赅，阐明了整体翻译策略和取舍缘由，读者可以先行阅读，这既使读者可以了解译作全文风貌，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也给读者带来了流畅的阅读体验。

最后，无论荷兰、日本还是在美国，我们常常在文学的地方性中思考“世界性”，世界的构成就是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共有知识”“共有伦理”的关联中传播与生产的。在各民族文学板块“迁移”的边缘，我们发现“世界文学”。在存在的门槛上遐想世界的时候，我们与伊维德彼此相遇。世界文学一直存在，并在召唤中，我们要么做出反映，要么重新陷入遗忘和被遗忘：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

Works Cited

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rtlett, Frederic C. *Memory: A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rans. Li We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8.]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Chen Yinke. *The Second Series of the Jinming*. Beijing: Life·Reading Wu·Xinzhil Sanlian Bookstore, 2001.]

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增订本引言，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Han Nan.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Trans. Xu Xia.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10.]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London: Continuum, 2004.

霍建瑜：“徜徉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广场——伊维德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10（2012）：77-88。

[Huo Jianyu. “Wandering in the Square of Ancient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Idema.” *Literary Research* 10(2012): 77-8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永：“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外国文学》4（2019）：166-175。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and Brain Tex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Foreign Literature* 4(2019): 166-175.]

Saussy, Hau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P, 2006.

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Sun Kangyi and Yu Wensuo'an. *Cambridg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rans. Liu Qian, et al.

Beijing: Life·Reading·Xinzhishi Sanlian Bookstore, 2013.]

伊维德: “元杂剧版本与翻译”, 《文化遗产》2014 (04): 46-56。

[Wilt Lukas Idema: “Yuan Zaju Version and Translation.” *Cultural Heritage* 04(2014): 46-56.]

—, *Personal Salvation and Filial Piety: 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f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

Honolulu: U of Hawaii P, 2008.

—, “Evil Parents and Filial Offspring: Some Comments on the Xiangshan baojuan and Related Texts.”

Studies in Central and East-Asian Religions 12/13(2002): 1-40.

—, introd. and trans. “The Precious Scroll of Chenxiang” i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 Ed. Victor Mair and Mark Bender.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2011: 380-405.

—, “The Filial Parrot in Qing Dynasty Dress: A Short Discussion of the Yingge Baojuan [Precious Scroll of the Parrot].”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0 (2002): 77-96.

周宪: 《文化间的理论旅行: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年。

[Zhou Xian. *Theoretical Travel between Cultur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7.]